

从全球视野看大生档案的世界意义

□朱江

通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大生初期档案能为全世界更多的人所认识，张謇企业家精神能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是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档案贡献。



1953年大生档案从上海回归南通，存放于大生纱厂公事厅。



张謇在创业伊始，即筹备大生纱厂开始，客观上就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的著作《棉花帝国》提到，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面对进口棉纺织品对国内手工业的压力，有着建立工业经济的愿望，巴西、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寻求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办法。《棉花帝国》随后以张謇作为中国的例子：张謇对大量棉纱和棉布进口表示关切，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建立外商独资棉纺厂的规定之后，他主张国内工业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建立了纺纱厂。

仲伟民在《棉花帝国》的中文序里评述说：棉花产业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杠杆和跳板，而且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还主导了世界贸易，与茶叶、鸦片、咖啡、糖、瓷器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比较，只有棉制品才是真正全球性的商品，只有棉制品才引致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只有棉制品能够调动全世界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大生

纱厂生产的原料是棉花，出品是棉纱，市场在已经对外开放的区域，由此面对的竞争是全球性，想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充分依托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与世界接轨程度最深的上海。按照《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的说法，“上海一直紧随着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的现代世界经济的消长盛衰而上下起伏”。大生纱厂所需的资金、物料、技术和人才，南通都匮乏，张謇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全部具备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上海，张謇连接了世界，采用外国先进的设备、管理经验，聘用外国工程师，选送学生赴日本工厂学习，对大生纱厂乃至南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张謇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与世界接轨，与时代脉动，更主要的是他将融入血脉中的儒家伦理，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期，张謇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互通中，

开启了企业家参与社会、改良社会的新路。

2022年10月5日，笔者收到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执行秘书长 Linh Anh Moreau 的电子邮件。Linh Anh Moreau 告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下属的注册委员会对于大生初期档案的申报书提出三点修订建议，并表示在申报单位即南通市档案馆提供更多信息后，将大生初期档案提交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大会表决。Linh Anh Moreau 在邮件中对大生初期档案的总体评价是：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是实业家张謇在创建和管理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形成的，是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反映。这种社会转型的经历并不为中国所独有，也为东亚邻国所共享。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作为这些经历的历史记录，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从一名士绅到伟大的企业家的转变，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和价值体系的变化。

在 Linh Anh Moreau 转达的三点修订意见中，第一点就是建议在申报书中加上一段话：“大生纱厂开创了一条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关心改善社会状况的全球趋势的新途径。”这句话是大生初期档案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大生初期档案揭示，大生纱厂的成功是张謇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与西方近代管理模式及

生产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张謇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引领者。这不仅是中国文明的精华，也是超越时代和空间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世界的共同记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项目”，旨在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规定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促进文化遗产利用，提高人们对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其所指文献遗产不仅包括纸莎草纸、羊皮纸、棕榈树叶、木片、石片、纸张等传统载体，还包括录音、电视电影作品和数字媒体等新型媒体。由于历史上的种种人为灾难、自然灾害，和现实中的化学反应和技术问题等原因，这些宝贵的文献遗产正面临着濒危、散失等厄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建立《世界记忆名录》、授予标识等方式，向政府和民众宣传这些现存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并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对上述文献遗产实现有效保管和抢救，进而促进这些人类遗产的广泛应用。通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大生初期档案能为全世界更多的人所认识，张謇企业家精神能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是讲好张謇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档案贡献。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我的父亲王太祥（王凝）是如东掘港人，很小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如东县是苏中前哨阵地的腹地，又是苏中与苏北相联系的一条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1年始，父亲历任如东县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联络部长、县大队队长等。父亲和白桐本在掘马南区并肩战斗，是亲密战友与好搭档。父亲是区委书记，白桐本是区长；白桐本曾在父亲家里住过。我的奶奶王云夏是一位慈祥、开明、勇敢的革命母亲，为他们做好掩护和保障，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英勇抗击敌人。

父亲与白桐本来掘马南区任职的时候，正是日伪疯狂“扫荡”“清乡”之际。掘马南区是日伪“清乡”区，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千名日伪警特工人员盘踞着十几个梅花桩式的大小据点。敌人经常多路出动，想消灭白桐本和父亲率领的区队，以达到摧毁区、乡抗日民主政权，从而实现全面伪化的目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斗争是十分艰苦曲折的，但是父亲和白桐本始终带领区队坚持原地斗争，越做越强，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

构筑封锁线是日伪清乡计划的重要手段，并视为“清乡”成败的关键所在。日伪在苏中四分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的同时，1943年4月还从江南运来五百多万支毛竹，从长江边的天生港向白蒲、林梓至丁堰向东经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南坎，直至黄海之滨的鲍家坝，沿着公路与河道构筑了一百多公里长的封锁篱笆，并且对长江沿线及一部分滨海地带，也筑起了一道封锁篱笆。这样，敌人对苏中四分区构成了长达二百多公里长的“清乡”包围圈。日伪曾经狂妄地宣称“篱笆筑成功，清乡便成功”“篱笆打好了，新四军跑不了”。所谓的“墙固”“封锁线”，确实造成了区内外抗日军民交通联络的困难，使部队运动受到限制，物资运输受到阻碍，也使群众的生产生活陷入困难境地。当时掘丁沿线到处流传着“竹篱

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为了打破日伪封锁，县委及各区委积极领导和发动广大军民，从日伪构建竹篱笆那天开始，就在掘丁封锁线上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破击运动。县警卫团、区队、乡游击队及广大民兵把开展反封锁斗争看成是反“清乡”斗争的重要环节，尤其是串场河北地区军民把破除竹篱笆看成是对“清乡”区内抗日军民有力的支持，因此每夜都要开展破击活动，先后拆除、烧毁毛竹二百多万支。仅以双岔北区为例，1943年5、6月间，全区先后出动五千四百多人次，进行了六十多次大小破击，破除封锁篱笆总长六十多华里，并摧毁封锁线上的多座碉堡。尤其是7月1日夜間，三、四分区成千上万的民兵在主力军的掩护下，分成几十路分别向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挺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击运动。这一夜，被拆大军迅速行动，砍的砍，拉的拉，拔的拔，

把有用的竹子打好捆，挑着扛着运回家；把运不了的竹子分段堆好，放火焚烧。延绵百里的烛天之火，使日伪苦心经营三个月之久的封锁竹篱笆遭到毁灭性破坏。这就是著名的反“清乡”斗争中火烧竹篱笆的故事，酣畅淋漓振奋人心。

地处日伪大据点马塘、掘港以南的掘马南区，在区委领导下，区队和民兵一直坚持在日伪建立的“梅花桩”式的据点之间，不断地向日伪据点发动军事政治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父亲作为区委书记与区长兼区队长的白桐本，经常白天带领区队战士，化装进入日伪据点开展活动，伺机打击敌人。有一次，他们在曹埠据点夺下了几个伪军哨兵的枪支；另一次在孙窑据点把一个伪军排长活捉下乡，造成敌人的恐慌；他们还经常在夜间深入到敌人的碉堡下面，给伪军上“政治课”，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仅曹埠据点的伪军，就先后有十多人携械



王太祥晚年参加纪念白桐本的展览活动。

□王燕子

王太祥与白桐本的革命情谊

向区队投降。所以掘马南区区队的威信不断提高，队伍也不断壮大，很快从原来的三十多人，十几支枪，发展到九十多人、八十多支步枪，还有一挺轻机枪。各乡民兵也迅速地发展到两千多人。他们带领区队和民兵开展游击战争，搞得日伪日夜不宁，闻风丧胆。

在他们的共同领导下，群众性游击战开展得如火如荼。掘马南区、汤圆区及掘东区，一共盘踞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据点。“清乡”区内各区队和乡联防队、游击队和广大民兵，根据敌人的一般活动规律，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创造了许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法，如伏击战、麻雀战、诱捕战、奇袭战、地雷战、攻心战、迷惑战等等，积小胜为大胜。

区长和区委书记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每月的待遇是一百六十斤大米、九十斤火药、九角钱菜金，但他们省吃俭用，把多余下来的钱粮救济贫困的农民。谁家有困难，他们总是挂在心上，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父亲和白桐本在人民中间生了根，人民爱他们，敬他们；当敌人要抓白桐本时，人民群众也挺身而出保护他。敌伪曾悬赏四十万元，捉拿白桐本。群众说：“就是金子堆成山，也休想在我们这里找到他。”有一次敌人收割，到了银杏乡捉住了陆妈妈追问白桐本，她对满脸杀气的日军说：“我家只有黄铜盆，没有白铜盆。”其实父亲和白桐本带领区队来看望过她，刚刚离开去执行任务。

如东军民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是十分艰巨的，既要挫败日伪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进攻，又担负着直接支援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苏中军区、四分区的正确指挥，还有全体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以及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巨大支持。

为了纪念白桐本烈士，苏中第四行政公署将掘马南区改为桐本区。我们纪念反“清乡”斗争，永远不能忘记人民英雄白桐本，而我，也会永远铭记父辈们携手革命，生死与共的战斗深厚情谊，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



历史人物

清官慈父育胡瑗

□彭淮 丛越

宋代大儒胡瑗，集教育家、思想家、军事家、音乐家于一身。他成功的人生之旅，起步于双亲的不倦教诲。

查阅如皋《胡氏世谱》，胡瑗之父胡訥（957—1027）是一位良吏清官。他是长子，字存仁，别号野溪，自幼聪颖，数岁时便能撰写文章。日后，他参加进士考试，于宋雍熙乙酉年（985）任工部员外郎。未入而立之年，已任职工部，实属不易。在他离世30年后，即皇宋嘉祐二年（1057）八月十日，朝廷颁布《诰命》，赞其德才俱佳，育子有方：“胡訥原任宁海节度，乃中允胡瑗之父，蜚声文艺，驰誉荐绅，操履端方，宅心平恕，崇礼让于乡邦，储经训于里閭，乃今有子贤官，聿兴家祚，佑启之德，庭训之严，厥有征哉。”

《诰命》作为皇家颁发的“荣誉证书”，往往不乏客套话。“蜚声文艺”兴许言过其实，不过《胡氏世谱》记载胡訥文章“汪洋闳肆，诗尤精妙，所著有《鹤溪集》十卷行于世”。胡瑗秉承家学，工诗擅文，其传世两首诗作录入《全宋诗》《历代题画诗类》等书籍。胡瑗次子胡志宁，也有诗作传世，录入《东皋诗存》。祖孙三代，皆有诗作存世，胡氏一族可谓诗文世家。

“操履端方”，赞誉胡訥人品官品。《胡氏世谱》有记，端拱戊子（988），胡訥与其他官员意见不合，吐露真言，因此遭罚，由工部员外郎贬为宁海节度推官。胡瑗很像其父，即便面对皇帝，都敢直言不讳。其曾孙胡濬记载，宋仁宗与诸生一起聆听胡瑗讲解《易经》。仁宗名为赵祯，祯贞同音。胡瑗说及“乾元亨利贞”，居然不避讳。众人皆失色。胡瑗临危不惧，缓缓释道：“临文不讳”，即研究阅读文辞时，无需避讳。幸运的是，仁宗的格局高过胡訥的同仁，当场表示理解。

胡訥的高贵品质，还表现在他作为一名廉洁官员，从未热衷官场，而是甘守“清贫乐”。胡訥遭贬为宁海节度推官，他干脆未曾上任。宋代名相吕夷简赏识胡訥才华，推荐他编修国史，他与堂弟胡谦谔一起赴任，又一起回乡，辟居如皋城西南十里的胡家庄。为官数载，胡訥未有积蓄，家中甚贫，以至于家中“不能自给”，少时胡瑗不得不远赴泰山求学。

言及求学，弘扬正气，胡訥在读书著述方面，无疑给胡瑗做出榜样。胡訥不仅“储经”（收藏经书），而且崇礼讲经，向里人宣扬儒家文化。他编著颇丰，可惜纷纷散佚，幸有著录。其中一种是《春秋三传评》十卷，研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日后，胡瑗著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各五卷、三十卷，同是研究《春秋》的学术专著。胡訥的编著还有：《孝行录》三卷，记述宋初孝子故事；《民表录》记载宋初循吏善政的故事。值得一提的还有《贤惠录》，讲述宋朝贤惠女子的故事。此书计三卷，其中二卷为胡訥所写，一卷为胡瑗所续。从读书到著书，相比胡氏父子，无疑是阿戎跨灶，但胡瑗在治学趣向，学以致用诸多方面，或多或少受到父亲的影响。

胡訥先后娶隋氏、陈氏两位女子，陈氏仅有《胡氏世谱》记述为京东转运副使陈微的女儿。隋氏也仅有《诰命》所述：性和而则，德惠而庄，爱劳海子，著名文苑。由此可知，胡瑗母亲是一位贤良淑德，又通文墨的女子。加之胡訥“庭训甚严”，胡瑗七岁就能撰文，十三岁便已读通《五经》。《宋元学案》记载胡瑗少时即“以圣贤自期许”，邻居感到惊奇，告知胡訥其子伟器，非常人可比。从小能文能学，又志向远大，胡瑗启蒙教育的成功，自始至终离不开他父母的谆谆教诲。



史海回眸

稻草铺床

□程太和

四五十年前的乡村，除了铜炉子，没有看到过其他取暖设备。晚上上床，两三个人盖一条破旧的棉被，那真是一个“冷”字了得。

对此，人们也有最原始、最生态的添暖方式，那就是在床铺上铺一层稻草，以增加温度。那时，生产队的稻草主要是留着耕牛冬天吃的，但为了老百姓的取暖，也按各户的人口分给农户一点稻草让农户铺床。队里选择一个晴好的天气，将稻草分给农户，各户挑回家中，可以再晒一下，也可以直接铺在床上。铺草时，大都是夫妇二人同时进行，一个捧草，一个铺床。铺的时候，要慢慢地将稻草掺和得均匀，否则，就有高有低，睡在上面很不舒服。铺上了稻草的床，睡在上面要暖和得多了。每隔一段时间，人们还要把稻草再捧出来晒一晒，经过太阳晒过的稻草，人睡在上面，当然更暖和一些。过去，一户人家都有几个小孩，特别小的孩子，夜里睡着了不知不觉地放尿，乱撒在席子上，也撒到席子下面的稻草上，那第二天就要把席子及浸湿的稻草捧出来晒干，然后再铺到床上。那时，老百姓家中若是来了很多客人，就要打地铺，打地铺就是用好多稻草铺在地上，然后在稻草上铺一条被子，人睡在被子上，再盖一条被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地铺了。冬天，公社召集干部开会搞冬训，一搞就是四五天、五六天，生产队、大队干部也是到集镇周边的农户家中用稻草打地铺睡觉。

生产队时期，每个队都有一个看场的工棚。那工棚是用杂树或“破四旧”时扒到棺材板做成的。看场，说得客气一点叫站岗，其实真正意义上是“睡岗”，这都是男人的事。男人们也知道“睡岗”也要睡得暖和，于是，工棚里的稻草铺得特别多，工棚四周还布满了比较整齐的芦柴草。冬天，睡在工棚里确实比较暖和，比家中的床铺都要暖和，笔者上初中的那段时间，就喜欢顶替父亲到队场上“站岗”睡工棚。上了高中后，到学校寄宿，也从家中带来一些整齐的稻草铺在学校的木床上。高中教师多数为公办教师，少数为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公办教师吃的是商品粮，烧的是计划煤，没有稻草来源。学校领导为了帮助公办教师解决稻草铺床取暖的问题，就用原始的“物物交换”的方式，用学校积累的粪肥向学校所在生产队换取稻草分给公办教师，让公办教师也能享受到稻草铺床的福利。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教师们铺床的稻草就成了点燃煤球炉子的“引火草”。这些稻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浪费的。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

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

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